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二一期 ——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110d)

- | | | |
|--------|--------------------------------|---------|
| 【口述历史】 | 草根政治：一条至死不渝的道路
——伊林、涤西口述（上） | 米鹤都·墨 诞 |
| 【往事如烟】 | 文学所的一些人和事 | 朱 寨 |
| 【各抒己见】 | 毛派今日之困境与毛泽东文革中的保守主义 | 王希哲 |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口述历史】

草根政治：一条至死不渝的道路
——伊林、涤西口述（上）

采写：米鹤都·墨 诞、编辑：米鹤都

◇ 前言

又是一度“九一三”，网上到处可见为林彪抱打不平的长篇短语。我对林副统帅素无好感，当然也并不赞同将文革前期的污水全部倒在他的头上。不过，他确如一些文章所言那般“睿智”和先知先觉，为何在1959、1962、1966三个历史关键时刻，他却都义无反顾地站在了错误的一边。其实他的功过都是非常清楚的。不说作为一个真正以人民利益至上的历史人物，就从爱护个人“羽毛”的角度，他也不至于做出哪些助纣为虐的勾当。

本文并非评述林彪的功过，而是由此想到那个黑暗时代中曾挺身而出的草根英雄。文革初起之时，曾经有两个不知名的北京中学生，给林副统帅发出了公开信。此信震动了全国，也激发了人们对绝对迷信的第一次反思。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远比此时正在制造现代迷信的林副统帅高明得多。尽管他们很快被镇压下去，但是依然对人民而后的反思留下了火种。

在1976年的那次人民群众奋起反抗文革暴政的斗争中，他们再次率先站了出来。1977年1月，他们和李东民等人一道，勇敢地在中南海、天安门和王府井等地贴出大标语，呐喊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追究镇压者的责任，呼吁邓小平的复出。很难说，这些当年的老三届们是什么先知先觉者，但是他们仅仅凭借着对社会和民族的责任感，再次站在了人民群众的前面。

当然，他们再次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两位草根出身的年轻人在文革中经历了数次的牢狱之灾和“群众专政”，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心中的追求和对社会的责任。到今天，尽管他们不仅没有安逸的条件，居住和生活条件都很差，甚至多次牢狱之灾造成的病痛也得不到良好的治疗，但是他们依然关注和探讨着中国改革的走向，保持着精神上的追求。

我并不认为他们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素养见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并不影响我对他们油然而生的敬意。记得1977年高考时，北京的语文考试中有一段鲁迅关于“中国脊梁”的话：“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很惭愧，这是我第一次读到这段名言，也正因为如此，我把它记在了心里。在2010年的寒冬，当我看到张立才（涑西）拖着伤痛的腿一拐一拐地走来，眼望刘握中（伊林）消瘦的背影在大风中骑车而去，我马上能想到的，就是这段话。

现将我对他们二人的访谈口述史发表如下，希望历史永远不会遗忘那些值得尊敬的人们。

——米鹤都

伊林（刘握中）、涑西（张立才），文革前均为北京农大附中1966届高中毕业生。文革伊始，只有十八、九岁的他们，本着对那场运动幼稚的理解，本着对理想社会的炽热追求，给中国的二号人物写下了《致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见本刊zk9903d——本刊编辑）这种无惧风险、挑战权威的大民主，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和深思，引发一系列抵制抑或反对文革思潮的“黑风”，从而遭到镇压。据他们揣测，或许是由于毛泽东认可了他们的部分观点，而亲自出手保护，才使得他们免遭了灭顶之灾。这一事件，被广泛载入文革史册。《第三只眼看中国》将伊林、涑西列为中国知识分子凤毛麟角的改革先锋；海外学者把《公开信》誉为中国自由主义的第一个萌芽。他们出狱后，虽经受长期的挫折岁月，却并没有磨灭他们的良知和斗志。1977年月1月，他们又与李冬民等人一道，在天安门等地贴出了反对“两个凡是”、平反“四五”和呼吁邓小平复出的标语，表达了那一时期人民的心声。因此再度遭受迫害。今天，暮临回首少年狂，他们依然对自己草根政治的一生充满热情和执着。

◇ 文化底蕴深厚的工人家庭

涑西：我祖上是从绍兴迁来北京的。我爷爷出生在北京，在京城民俗文化中也算是个代表人物，既玩虫，又玩鸽子。他养鸽子在北京是有名的，养过五百多只鸽子，其中有二十只“铁翅”（1）。当年有人拿一所房子换这二十只铁翅，他不换。他还爱好说书、唱京戏，家里还放着两套家伙什呢。他对古往今来的历史很熟悉，尤其是能给府台那些老太太们讲书。他戏唱得也很棒，唱老生，有一帮子票友，经常到我们家来，吃喝不分。有的票友后来还成了北京京剧团的一级演员。我奶奶是京城的旗人，那时满汉通婚对社会的底层是不限制的。我奶奶记忆力特好，会讲易经，诗经也讲得棒着呢，我虽然也能讲点，但是不如她。她文化不高，但在我爷爷的影响下她也能讲这些东西，这也是怪异的事。所以，她长寿，她能把她那点文化底蕴传播给孩子们，这是家传造就的。

我父亲生在北京，没正经上过学。他也喜欢唱京剧，但够不上票友，不过他写得一手好字。他那字是柳体和颜体结合，也算得上一流。当年是北京广济寺还是哪个大的寺庙，曾找他去抄了三年的经文。解放前，他干的事很杂，在大栅栏的一家大烟馆管过一年账，后来在石景山钢铁厂开过火车，也算是个产业工人。解放后他干的是水暖工，实际上，他那样的工人很少，能写一手漂亮的字，会唱戏，拿起什么东西来都能修，包括电器。所以，他应该是个杂家。

我母亲家是北京郊区的农民。我姥爷的书画有些功底，祖上有点家产有点地，但到他那一代就不行了。姥爷没赶上解放就死了，也就没有划成份。我母亲没有单独划成份，算是城市贫民吧。小时候，母亲对我们的教育是很严厉的。我要是在外面惹事了，不管对错，回家先揍我。我有三个姐姐、两个哥哥，我最小。我们那时住在珠市口澡堂子胡同里。胡同口有一个山东裁缝，娶了个老毛子媳妇，生了一堆二毛子。其中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大，我们俩在一起玩拍“洋画”〔2〕。我赢了，他跟我抢，抢完了就跑，我们就打起来了。打完了，我也没当回事，回家了。谁知，我正端着一碗西红柿的盖浇饭吃呢，那个俄国胖妇女，带着他儿子找来了。她跟我母亲说，我儿子把画拍得翻过来了，这画应该归我儿子，你们孩子把这画抢走了，还把我们孩子鼻子打流血了。他的鼻子是有一点血，但怎么流的血我并不知道。我妈一听，上来就给我一巴掌，啪地把碗都给打飞了。我母亲就是这样严厉，不管你对与错，就是不能在外面惹事。

◇ 与国共元老渊源深厚

伊林：我出生在一个当年逃亡台湾的反动军官的家庭。别人都很惊奇，我这样历史背景，怎么会进入到这个红色的高级圈子里头折腾？其实非常简单，这跟我祖父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刘家的高祖做过清朝提督、军门之类的官。我的曾祖父参加了辛亥革命，在广西钦州率军起事。祖父刘葆村，是早期国民革命的元老，但却不是国民党员，也没参加辛亥革命。但他是从1917年就开始跟随孙中山先生的。我的姨祖父胡亮汉，是辛亥革命的元老，他们这一对“油盐坛子”〔3〕特别要好。我爷爷跟我说，他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先生的时候，就觉得“孙中山英气袭人，一下子就被孙先生吸引住了”。这是他的原话。这样我的爷爷就跟着孙先生干革命了，先在广州军政府，后来又跟着谭延闿先生，在韶关大本营给他当财务方面的一个委员。他们俩关系也非常亲密，亲密到谭三，即谭延闿先生经常坐在马桶上跟我爷爷聊天。后来谭三先生任国府主席的时候，我爷爷就给他当类似总统府总管的职务。

另一方面，我爷爷跟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何叔衡、郭亮的关系也特殊。共产党还在摇篮里的时候，我爷爷就帮助过共产党。道理其实很简单，他根本就没什么阶级斗争的政治意识，只认定何叔衡、郭亮都是他的好朋友。我爷爷那时做过烟酒税务局的局长，共产党缺乏活动经费嘛，何叔衡就经常跟我爷爷要钱。他们把这些钱再转给毛泽东他们。这帮人在反政府，在折腾，可我爷爷不管那些，因为你是我的朋友，咱哥俩好。他兜里有几十块光洋，就都给他，再要得多，就回家拿上一百块、两百块现大洋。有天，何叔衡见我爷爷说，葆老，我要请你吃牛肉面。其实我爷爷比他岁数小，但他叫我爷爷葆老。何叔衡觉得欠了我爷爷几次人情，吃碗牛肉面总还是应该的吧。我爷爷说，吃完面，何叔衡把这个碗，咣当一下扣了过来，举起拳头砸了个粉碎，说中国就像这个碗，要打碎了重新做。这是我爷爷亲口跟我讲的，他说中国后来还真的像何叔衡说的那样，打碎重组了。这让我印象特深。那时候，像章士钊，也给共产党钱。他是一回给个一万、两万，我爷爷每次是一百、两百，有时多点也难说。因为好朋友嘛。所以在我心里面，所谓的阶级界限从小就很淡漠，没什么概念。

共产党也救过我爷爷他们的命。在军阀割据时期，有一次是北军追南军〔4〕。我爷爷跟我姨祖父都是南军的代表，他俩就跑到株州江边，没地方跑了。正遇见郭亮鼓动一帮工人在那闹罢工呢，他就招呼我爷爷、姨祖父藏到那些船工的舱底下了。北军那一连人端着刺刀过来，问

郭亮，南军的军官呢？郭亮说我们这么多人在这里，不知道哇。北军就用刺刀翻，我爷爷说，刺刀就在头上，差一点就捅进来了，吓得他俩趴着不敢动。北军走了以后，郭亮招呼那帮船工，派人护送我爷爷他们到广州，到了比较安全的地方才走。我爷爷说亏得郭亮救了我们一条命。后来，郭亮被国民党杀的时候，我爷爷难受极了。郭亮的头就挂在那个城门上。有半年多的时间，他都绕着那个门走。因为郭亮的头在那挂过，他受不了，总是老远、老远地绕着走。我爷爷并不赞成共产党，但是他和这些人私交挺好，都是好朋友。我爷爷后来讲的时候还非常伤心呢，这么好的朋友被杀了。

◇ 初识阴暗和自力更生

涤西：我算是工人出身，文革时期混了个红五类，但是个温和的红五类。我家这成份实际上不太纯，有点杂，属于老北京人那个范畴。我小时候接受的都是集体主义教育，爱党、爱国这套思想路数。但是，我也看到了社会另一面的一些事情，印象很深。小时候跟我一起玩的一个孩子，他爸爸当时是摆小摊的，体型彪悍，解放前是阎锡山的一个团长。1953年搞镇反运动，有一天，那孩子来找我，说他爸爸被逮走了。我说，是吗？我们赶紧跑出去看，警察正从胡同里往外逮人呢。一辆苏制的嘎斯69吉普车，车帮周围和上面都围上了铁网，然后，逮来的人被五马倒三蹄地捆起来，塞进车里。一辆嘎斯69里塞了十来个人呢。后来怎么样就不知道了。

1957年反右，我二姐夫被打成了右派。他当时是物资公司的统计员，对公司的党支部书记有意见，就写了首古体诗贴到那儿，讽刺人家党支部书记。那人家不弄你弄谁啊？这一弄进去就是几十年啊。这件事对全家都有影响啊。当时，大家都劝我二姐离婚，只有我三姐对二姐说：他对你挺好的，而且你们还有两个孩子啊，就别离婚了。你就这么等他吧。

他当时被送到德胜门外的一个暖气片厂，当时叫劳改厂，监督劳动。刚开始还准许他回家，从文革前就不准回家了，文革后更不用说了。这样，我姐姐就得经常给他送东西去。由于拎的东西多，就让我这小弟弟陪着她去。我们每次到了那里，要拿着东西蹲在那等着，还得低着头。每逢送东西的日子，劳改厂大门外边的家属就蹲了一大片。这件事让我很受刺激，对我的心灵是有一些伤害的。

1959年，我们家先是搬到先农坛南边，后又搬到北边去了。先农坛南边以前是皇帝亲耕的一亩三分地，那红墙齐齐整整，有一米多高。解放后是抗菌素研究所，用来养牛、羊、鸡的养殖场，提供动物血液做药物培养用的。我父亲那时是这个单位的职工。大家都住房困难，知识分子没房，技工也没房，我们原来租的是私人的房，后来就跟单位要房，被分配到那去了。到了那，发现院里的知识分子不少。跟我们一墙之隔，就住着两个留苏的专家。

也是从那年开始，全国就进入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了。大家的口粮都很紧张，粮食不够吃，怎么办？我当时只有小学四年级，每天早晨就起来平整坡地，整出有小半亩地来种菜。那地都是硬地，里边净是石子。我先挖了50个坑，把那个坑挖得跟坛子似的。离那不远，有一个以前埋死动物的地方。那儿的土质肯定没问题了。我把那儿的黑土再挪到这些坑里面，垫在底下做肥料，这些都是我自己干的。当时也没人告诉我应该怎么种地。我就自己捉摸，种得可棒了，一个坑里能长出两颗南瓜。一般人可能都没见过，我种出过50斤的大南瓜。我把最大的南瓜送给了小学的一位老师，因为她老教育我一心为公啊、集体主义啊、为这个国家奋斗啊等等。这些思想就是那时在我心里埋下的根，我这辈子后来受的罪也都是因为这个根。

1961年的时候，我爸爸说，锅炉房旁边有块空地，你给接过来，种白薯。我说行，后来又种白薯。我把地翻得很深，在小山包上掏了一大堆灰，把这灰垫进去了，浇上水，太阳晒三天，然后把秧子往上一栽，这白薯长得也好大。我属于程序性的人，包括我后来在工厂做划

线钳工，做事很细腻，这都跟小时候种地有关系。打个比喻，这就跟理性自由主义与激进自由主义似的，理性自由主义像是做细活的，那激进自由主义就是做糙活的。

◇ 另类俱乐部——湖南老人会

伊林：我爷爷原来在长沙，土改的时候，就到北京来了，后来又写信，把我祖母、二姑和我也接到北京来了。我小时候是跟着我妈妈，九岁后就到北京，跟我爷爷、姑姑一起过了。我爷爷在北京有一个老头子群体，在北海公园、中山公园内经常聚会喝茶，或在曲园、马凯餐厅会餐，叫做湖南老人会。祖父常带我去，见了这位老先生要叫伯爹爹或伯植（5），见了那位要叫叔叔爹爹（6）。这个湖南老人会，沾亲带故的，跟共产党的很多领导人，特别是跟毛泽东这个大巨头关系好，不是亲戚就是师友。那帮老头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平日在一起就是下下棋，喝茶聚餐聊聊天，喜欢论政，在一起也说些“反动”话。在他们的眼里头，有好些事都是在小圈子说的，也不传到外面去。

这帮人里面有章士钊、王季范、黎锦熙、仇鳌、周道如、刘达奎、文七爹、李淑一等，约六十人，都是湖南人。这些知名的、摔在地上带响的人物，都是当年国民党的高层人物和一些上层的遗老。这帮老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儒家，信天。他们讲毛润之如何，我那时候才九岁多一点，不知道说的是谁，摸不着头脑，后来才知道。

1960年饿死了很多人嘛。也许是他们的良知吧，他们直言谴责那时代的许多做法，甚至批评毛泽东本人的一些做法。那些老人，还说些连右派都不敢说的话。例如说，那美国人就是好，人家富裕。美国人怎么会打原子弹呢？他们是不会发动战争的。还有人说，彭德怀说大跃进是搞糟了，大跃进就是搞糟了嘛等等。这都是他们当时的原话。

那个文七爹，有一回从乡下跑到中南海的大门口，坐在地上又哭又闹要见主席，说家里没饭吃咯，饿死人咯。警卫人员报告说，门口有一个老头闹。主席问，姓什么？警卫回答姓文。主席说，让他进来吧。那是他表哥呀，他没辙。

正因为他们都是些遗老，威胁不了政权；再一个又跟毛主席本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也没人敢动他们。但是，如果没有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我敢说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敢在六十年代前后，如此放肆胡言的圈子了。

还有一个故事，也是少有人知道的，就是毛泽东的那首“蝶恋花”。这是李淑一亲口跟我四姑说的。四姑小时候是李淑一父亲的学生。毛泽东诗词做得非常好。“蝶恋花”这首词，你仔细读，确实有感情，但这感情是对谁的呢？一般人都听不出来，其实这是对李淑一本人的。刚开始毛老头追的不是杨开慧，而是李淑一，这一段秘密谁也不知道。我读来读去，一直琢磨不透，我总觉得老毛这感情，应该首先是面对一个活生生的人的，而不是对一个死去很久的人。同病相怜，“同病”事实很清楚，“相怜”呢？于是，我就要四姑去问李淑一。她讲了这段故事，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么回事。李淑一当时跟毛说，润之，我已经有了柳直荀。这让少年毛泽东很伤心，她后来就介绍了杨开慧。我爷爷跟李淑一的父亲是好友，还把我姑姑放在他家作入室弟子，说放在你们家待几年，在家关着门教。

所以，这帮老头跟毛泽东的这种关系啊，导致我心目中有两个毛泽东，一个是外边的毛泽东，还有一个是这个圈子里的毛泽东。在这个圈子的毛泽东是个人，活生生的一个人，他不是什么神，他跟这周围老头都一个样，因为他们口里的毛润之，就跟老朋友一样。因此，导致我没有对他特别、特别崇拜，没有那种概念。

共产党和国民党就像是一对难兄难弟，今天打架明天握手。像谢觉哉，他跟我姨祖父也是一对油盐坛子，都是学法律的同学。可他们一个是共产党，一个是国民党，可是他俩关系也是特别好。谢觉哉每次有危险的时候，就跑到国民党湖南省法院院长、也就是我姨祖父胡亮汉家里躲起来。我祖父当时也和姨祖父住在一块，你说谁敢来抓。后来，我的两个表姐全是谢觉哉的孩子谢范将军给带到新疆军区去的，连嫁人也都是他给张罗的。我祖父和李维汉也是朋友。撇开阶级分析，这之间是种什么关系？

那会儿，湖南经常有人来找刘少奇、滕代远、李维汉这些领导人，跟他们要工作，要钱。因为湖南一帮老乡觉得共产党这些领导人欠他们的，当年搞革命时，得到过这帮老乡的支援和掩护。危险的时候躲到这些老乡家里，经常有这种情况。我听母亲讲，杨开慧被杀的时候，我的曾外祖父傅梅根曾联络了一帮湖南的名士，给何键上帖子，要保杨开慧。何键是我曾外祖父的门生辈，我曾外祖父也是湖南有名的书法家，联名上帖的又都是当地的一些文豪、绅士。虽然没有保下来，但是，你说这情份说得清楚吗？

我父亲刘远是1918年生人，王季范的学生，黄埔军校十五期的，比郝伯村低一届，也是郝的下级。我父亲是天然的国民党，抗日战争时期一直在九战区，后来在汤恩伯的部队、陈诚的部队都待过。我们家跟陈诚的关系很铁，陈诚是谭三先生的女婿，宋美龄做的媒，我爷爷跟谭三先生又是那么一种关系。但我父亲不善交际，也不会利用这个关系。在南昌九战区的时候，是我母亲帮我父亲张罗外事、人际关系，我母亲后来又没跟着父亲走。我父亲去台湾的时候，31岁，是个上校，我叔祖父是个少将。当时我父亲带了一营人，不想走了，把一营人撂到江西，他一个人回家了。家里是有老有小，拖家带口的没法走。我母亲跟他说，你带着一个营的人，你要对这一营人负责任啊。这样，我父亲才去的台湾。这是我父亲后来告诉我的。不过，蒋先生只信任江浙人，不太重用湖南人。我父亲在台湾最后也就做到少将，任二十七师副师长、澎湖列岛联勤指挥官。我母亲把自己的老公送上将军的位置，自己却倒了一辈子霉。

◇ 集体教育和思想启蒙

绦西：我有个姓李的老师，出身书香门第。她总是教育我们要爱护别人，这样你才能得到你要的东西，这个教育太深了。比如，她让我们凑集班费，去救济那些交不起学费的孩子。她说，你们自己想招儿，但是要合法合理。我当时是少先队小队长，我会种地呀。于是我跑到天坛南头的那个旧打靶场，那地方很荒野，早期还有城墙呢，后来是阅兵时候坦克车练兵的场地。我就在那里种了好多蓖麻，等蓖麻收获后卖了，把钱交给老师，让贫困的孩子有了学费。那时一个班里总有几个贫困孩子。

李老师对我们的集体主义教育并不是坏事，在我们早期的性格形成中起了重要作用，使得人和人之间有个亲近的感觉，互相有个照应。到现在六十多岁了，我们小学同学还能在一起聚会。大家都成老太太、老头了，见面后特感慨，感觉更亲近了。

当时学校的教育和家庭的文化背景并没有什么冲突，只是李老师的个性特别强，对我们的教育人性化更多一些。她一辈子没结婚，学生到她家玩，她都管饭。她把自己的感情注入到了对孩子们的教育之中，教育掺杂了一些个人情结。但是，她这种老师是“不得烟抽的”（7），一有政治运动，她就受点打击或挫折，蔫了，积极性下来了。等政治运动过后，她的积极性又上来了，热情又恢复了。

我上中学第一志愿是二十六中，但分数不够，上了第二志愿四十九中。初中时期好像值得记述的东西不多，生活学习都比较简单，学习成绩也一般，不是拔尖的，但也不费劲。印象深的就是四十九中的华侨学生比较多，有的一个班就有十几个华侨子弟。我小学时没接触过华侨，

初中时班里的几个华侨全是女同学。我那时不太习惯跟她们交流，她们喜欢用香水，衣饰有的也花里胡哨的，那个年代总觉得别扭，闻着香水味觉得呛鼻子。

小学和初中的时候，我开始养成读书的习惯。我和邻居关系都很好，那时对那两口子留苏专家的书籍感兴趣了。我早上五点钟就起床了，摊开一本书，读读外语、经济类书籍，然后再去上学。比如《普希金诗集》、《牛氓》，巴尔扎特、雨果、十二月党人的那些书籍都读，虽然是懵懵懂懂的，但每天这样坚持，一气乱读。后来就把留苏专家家里的书都读了个遍。

高中我上了农大附中。学生成份中高干子弟多了一些了，班上也有几个喜欢读书的同学，于是有了一个交流读书心得的环境。我们班比较独特，有五、六个学生是喜爱讨论的，因此，我们在高中的三年里养成了一个读书加讨论的风气。那时，我们也看一些“白皮书”，是干部子弟的同学从家里偷着拿出来的。大家都是你看完我看，我看完你看，传着看，然后再一起讨论。

那时候，我住校，我妈每个月给我十二块钱。我二哥已经工作，在教书，每月给我五块钱，加起来一共有十七块钱。那时候这就很富裕了，吃饭用八块，其余的几乎都买书了。我在上高中的这三年里买了许多书。

我当时记得拿破仑说的一句话：对任何一本书和任何一个陌生的人，都迫不及待地接近他，接收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这是《拿破仑传》里头唯一在下面加了着重号的一句话，它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独立思考，实际上就是自由主义的种子啊。不过当时像我们这样的思考问题、讨论问题，而且还经常有些与大家不一样的想法，家里都不满意，认为我是走上歧途了。

大概是在1966年提倡教育改革，我们已经高三了。刘握中对这件事很积极。文革前的毕业考试，他只考理科的数学、物理、化学这些课程，而且只答基础题，整个六十分就行了，剩下的题就不答了。文科的政治、语文，他干脆不答，都写上教改建议。刘握中比较不合群，他吃完饭，就自己思考问题，跟同学交流不多。他挺冲动的，要么不说话，一说话就容易激动起来。他有灵气的一面，老是走在前面，有些新的想法。我的性格跟刘握中不一样，我是很踏实的那种，对教改并不热心，不过这对我们也有影响。所以，文革一开始时，我就跟他一起给校长写大字报。

◇ 划分“右派学生”和“血统论”

涂西：工作组进学校后，就热闹了。各班成立了文革小组，一个班选三个人组成领导小组，我被选中了。另外两个，都是军人家庭出身的学生。来我们班的工作组干部是共青团系统派来的，他给我们班开会，在学生中划左中右，说全校别的班都不划右派，就划你们班的右派。他要划的第一个右派就是刘握中，理由就是反动军官家庭出身，而且老有独特的思想。还有一个工人的孩子，也被划成右派了。他是因为和班里文革领导小组的另外那俩人不对付，对着干。我不同意在中学生中划什么左中右，而且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坚决不同意。可是，我只有一票，人家是两票，两票否决一票呀。这时，学校的工作组组长还说，你不给他们划右派，你立场就有问题，你就是右派。我想这下坏了。

不过，我有亲和力呀。于是，我就把班里的三十来个同学聚到河边。把大家叫来，集体讨论这个问题怎么办。我说，咱们都很年轻，十几岁给划成右派了还了得？我家就有个右派，我是有亲身体会的呀！我姐姐这一辈子都处在痛苦中，她的两个孩子也很痛苦，婚不能离，不离婚就得背着这个沉重的包袱，一生的前途都这样糟蹋了。大家都同意我这个观点，就是死不同意。你要是划右派，我就纳入集体讨论，这个孩子是不是应该划成右派？咱们是多数，咱们就给他们来个否决少数。我们班一共有四十六个人，我招来了三十来个人，这三十多票就可以否

了你那十几票。我采取民主的方式斗争，就这样斗来斗去的，把时间抗过去了，没几天工作组就撤了。

工作组撤走后，我就自己张罗组织了一支红卫兵。我们学校当时有三支老红卫兵组织：“红旗”、“红卫兵”，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八一八红卫兵”。他们两个组织成员都是所谓的红五类。我们的组织原则，基本上是只要愿意进来的都可以，出身不好也可以来。大家都是平等的，这是我原始的观点，很朴素的。不过，刘握中当时没参加进来，他是独行侠嘛。

但这时“血统论”就泛滥起来了。有一天，“红旗”的人把刘握中叫过去了，说他出身反动，思想反动，有野心，在办公室里拿皮带抽他。有同学跑来跟我汇报，说刘握中在那挨揍呢，怎么办？我说，在门口等着。他出来后，赶紧把他架到宿舍，浑身都是一道道的淤青，后背都肿起来了。我让同学给他上药，他之后就躲起来养伤去了。

伊林如是说：我在文革初期是挨了一次打，那实际上是件使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我们班有一个女同学，她看上我了，同学中这种感情是说不清楚的。她对我挺好，一是我那时候还没有开窍呢，对她没什么感觉；二是她出身那么好，家里是军队的干部，我出身这么坏，她怎么能和我粘乎乎的呢？我就没应承。她文革初期加入了学校的“红旗”，结果她找了一个机会，把我骗到他们“红旗”办公室，揍了我一顿。亏得我们班另一个“红旗”的同学出面打马虎眼，所以也没揍得怎么样，我就跑了。就这么一回事，把这看成是笑话也行。当时社会的人性扭曲了。她是把爱、恨两种情绪叠加到一起了。所以，我不同意在感情方面，有什么社会科学问题。按社会科学的观念，这个现象就说不通了。

涤西：这时，我们学校就发生大事了。

那年的8月26日，我们这几支红卫兵联合开会。这时“红旗”就开始揪狗崽子，说要把学校里出身不好的同学都给揪出来。我一看这势头不好，就叮嘱我那组织的人：人家打人咱们可别打人，人家揪人咱们可不要去揪。我们“八一八红卫兵”中有一个干部子弟，我单独嘱咐他，就怕他打人。因为他有个情结，曾追求我们班一个很漂亮的女生，人家不搭理他。而这女孩出身不好，她爸也是国民党军官，逃到台湾去了。我就怀疑他想去报复人家。结果他们还真抓她了，揪完了就在教学楼前面的通道上，让她跪在那，拿皮带开始抽。那场面惨不忍睹啊，跟法西斯似的，非常凶残。他们让人都跪在操场上，胳膊还得撅起来，做燕飞的姿势，脑袋贴到地上，屁股撅起来。然后，用皮带抽屁股、抽脊梁。

这跟当时那幅“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是有直接关系的。对联贴出来后，我们班还可以辩论，但在其他班就都不成了。学校里已经没有讨论和辩论的氛围了，形不成反抗的力量。这是比较凶残的一次，全北京也没有这样大规模地打人的。学校教职员、学生一共揪了一百二十多人，打人的是“红旗”的。那天，我也没辙了，就赶紧给中央写一份报告。我们学校只有高中部，加上教职员一共才五百多人，结果就有一百二十多人挨打了，而且还打得惨不忍睹。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可不得了。

这份报告，我是跟大家商量着起草的，以“八一八红卫兵”的名义，把当时发生的事情经过讲了一遍，有多少人被打，多少人被打伤了。这事后来被农大附中称为“八·二六事件”。我把报告直接递到中南海那个国务院接待办了，在那里待了六天。那时，谁也顾不得上这事，所以，报告也没了下文。

在这个事件中，我们“八一八红卫兵”中只有上面提到那个干部子弟的同学一个人参与了打人。他后来跳槽加入了“红旗”。不过，到年底他又回来了，而且还主动帮助我们躲避迫害，

修建密室。

◇ “致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的诞生

伊林：我那时没有出去串联，一直在关注着文革的理论动向。1966年10月份的时候，我在清华大学的图书馆里碰见一个人，那人个子不是很高，但脑袋比较大。我并不认识他，但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经常会有这种邂逅的聊天，还经常会遇到知己，不像现在首先怕对方是个骗子什么的。我们在一起聊了三个小时。他说要林副主席接班可不行，林副主席不可能像恩格斯那样。他说林彪有法西斯倾向。我当时没有这想法，但是我对红卫兵打人这套东西很反感，林彪不是煽动这个吗？所以对他说的这点也容易接受。再一个起因是，当时有一种怀疑一切论，怀疑一些理论思想、怀疑一些观点，这种思潮对我也有影响。我那时还写了一篇文章，寄给武汉的《长江日报》，就是论怀疑一切，写了大概有一万多字。

为什么起草那封《公开信》，关键的是受到北京师范大学的李文博和北京大学的乔兼武的影响。乔兼武1966年8月26日写了“造三个大反——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的大字报，李文博1966年10月17日写了“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的大字报。我为此找过李文博，认识以后跟他们聊过。他们在大字报里鼓吹一种大民主、国家体制改革的新思潮。所以，我们那个《公开信》里头有这个“公社”和那个“大自由”的思想。当时是做了毛泽东赞扬的事情，他对此是赞成的。毛泽东曾说：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是可以的，彻底改善是不行的。这是毛泽东原话，是他看了我们的《公开信》以后说的。

张立才那会儿串联去了，他回来后也和李文博、乔兼武认识了。我和立才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他在武汉看到林彪的“九·一八”讲话后，说毛比马恩列斯的水平都高，很是讨厌。我也讨厌那个讲话，觉得吹捧得太过分了。我们俩是一拍即合。虽然我先起草了个草稿，但还没有完全成形，于是，我就把草稿拿给立才看了。

这篇大字报确实有很多目的，但有人说主要是反林彪的，其实并不是这样。这可以看原文，我们写公开信的目的是为了监督——广大人民监督和批评国家领导机构和国家领导人的权利，这在大字报里是公开讲到的。现在，有些香港做学问的人乱写评论，我说你不看看这个目的，这个目的是非常清楚的。我们不是反林彪，只是对林彪有批评意见。这中间有个很大的误会。

涤西：10月份，我带着我那红卫兵里的十来个男生，到广州、武汉、成都、重庆转了一圈，回来又转回到武汉。我觉得继续跑也没什么意思，就一个人先回北京了。回来看到这些大字报已经在开始探讨国家改革、大民主的课题了，这对我们俩都有很大影响。这时，大家都在外地串联呢，宿舍里没有别人，我们俩就敞开了探讨，一晚上、一晚上地聊。

文革开始后，实际出现了一个机遇，就是激励我们去关心国家大事，去想一些过去肯定不敢想也不可能去想的问题，至少形式上是这样。譬如，是不是允许一般人监督党的领导人这样的问题？这个权利怎么确定？程序怎么确定？国家构架怎么确定？当时觉得这很有意义，很值得探讨。因为我们以前也看过一些白皮书，包括一些探讨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的，还都有印象，有这个原始驱动。我们在探讨中，刘握中提到了林彪的“九·一八讲话”，这个讲话我是在武汉从大字报上看到的。当时看到后就觉得很不舒服，完全是个人吹捧。我们俩对这个“讲话”的观点都是一致的。聊着聊着，他就说，咱们能不能就这个问题写一张大字报啊？我说，写大字报有什么意思，给上面写信意义也不大。其实他在跟我聊之前，就已经写好初稿了。这时，他把那个初稿拿了出来。但他还是胆子小，他说，干与不干，都由你决策。历史就是这样，最后决策干还是不干，是他推着我说出来的。

我看了稿子以后说，咱们先不说干还是不干，斟酌一下再说。先把其中一些激烈的文字去掉，换上温和的语言。改动最大的就是批判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第四条。刘握中的初稿列上了“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全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这一句话，但是我把他批判这段话的内容全给删了。因为我一看脑袋就大了，我说这条不能批呀。毛泽东不是说，“唐宗宋祖、略输文采”吗？他多伟大啊。我说，虽然文章我还没细看，但这条一定得拿下来。当时这条批得一个比较牵强，另外一个你就是再温和也不行呀，因为你必须直面毛泽东了，这一面对就越线了。最后的一段文字是我加的。

修改完后，我就决策了：干。我说，要干就公开干，不能寄信，寄信是扯淡。公开就得按大民主的方式写大字报。我的毛笔字比他强，大字报由我来抄。落款，我起了个名字“涤西”。这是我在学校写大字报一直用的名字，农大附中的同学都知道是我的笔名，取意是“荡涤西方一切污泥浊水”的意思。其实，“涤西”还确实是毛泽东用过的笔名，我不愿意粉饰历史或再编造，我说的都是挺真实的。我对刘握中说，你快点起个名字。他就在那翻《列宁选集》，翻着翻着，翻到一篇文章，看底下中文译名是伊林。他说，那我就用伊林吧。我们把大字报贴到了清华大学小礼堂旁边的科技馆那里，那里是贴大字报最密集的地方。那天是十一月十五日，我们早晨六点钟跑过去，七点钟贴的。对我们这笔名，后来解释就多了。“涤西”跟“泽东”对应，这还真是挺巧合的事情。

贴完大字报以后，我就回家了。晚上，我返回学校时，刘握中告诉我，蒯大富派人把我们的大字报给撕掉了。大字报被撕了，我就有说法了，我们又写了一份，贴到北大去了。这两篇大字报抛出去之后，就有人对那篇大字报表示支持了，也有来串联的了。但蒯大富他们政治敏感性还是挺强的，说我们这是反革命的大字报，反对我们。这时，刘握中闪开了，出去串联去了。后续工作都是我来了。

◇ 《公开信》的真正公开

涤西：大字报被撕掉后，我感到事态严重了。我一不做二不休，就组织人印传单。我找了班里一个同学刻蜡板，刻到一半的时候，他的女朋友来了，认为这事危险，不让他干，把他给拉走了。我只有自己继续刻下半部分，并且随刻随写了《公开信》后边的那段文字，还加了两个后缀。现在一般看到的是传单上的文章，这最后部分的文字是原来的大字报上没有的。后来在社会上引起震动的也是这张传单。一张蜡纸一般也就能印个八百份到一千份，我亲自推油碾子，不让别人动，我推得非常仔细、小心，生怕这蜡纸破了。我那派的红卫兵是同意我的观点的，我们实际上是一个团队。传单用的是十六开的纸，共四页，其他人负责叠页子，装订。我拼命地印，印了一千二百份，直到那张蜡纸已经不能再印了为止。

传单印好后，大家轰地跑出去，分别到各大专院校、各军队和机关大院的门口，一路走一路贴，满世界散发传单。传单的影响实际上比大字报大多了，贴出去后，立即引起社会震动。中央文革、江青要去看的是传单。我们在大字报上落款写了农大附中伊林、涤西，也直接签上了刘握中、张立才的大名。而传单的落款只写了农大附中伊林、涤西，因此知道我们真名的人并不多。

现在回头看这篇文章，当然还是很幼稚的。那时候年轻，刘握中十八岁，我十九岁，而且我们当时对林彪这人物并没有多少了解，也没法了解。为了澄清我们并不是刻意反对林彪，更不是反对文化革命，只是不满意林彪的讲话内容而已。在一种幼稚的担心下，我们提出林彪要改正缺点，不改正缺点的话就要“靠边站”，其实是很感性的东西。这里面分量最重的一个词就是“靠边站”。对这个“靠边站”，我写大字报时就觉得有点忐忑不安，印传单的时候，我觉得

这个问题还是道个歉吧。所以，我在传单最后特地加了一句话：如果有人指责我们说，靠边站是过分针对个人的话，我们一定接受批评。结果，传单上最后就出现了三个“靠边站”。

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当时真诚的表示。后来有很多史书、史评都把伊林、涤西事件说成是反林彪了。当时要真是反林彪，首先我就不干了。我们主要是提意见。

伊林：对这篇文章，我们俩是一起讨论、修改的。我起草那个文章时，摘选了林彪讲话中的四条进行批驳。第四条是，林副主席讲，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现一个像毛主席这样的天才。我当时就对这个有怀疑，可是《公开信》中对于这一条的批驳没下文了，后来朋友问为什么没有下文。其实，原来有一段进行批驳的评论文字，被立才给删掉了。他认为这条太尖锐，因为直接触犯到毛泽东了，而且又不好驳。那文章里面已经涉及到毛的权威了，包括毛主席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贡献等，都给推翻了，已经是不得了的事情了。再往下去论毛泽东个人的事，这个问题确实不好去碰。这是立才最担心的。但是，这实际上又是一个大的问题，所以留下题目没内容，这叫立而不论。就留给他老人家自己去猜，去论吧。毛泽东对《二十四史》倒背如流，他能不明白这个？

《公开信》是立才决定要公开的。他说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寄过去，那这封信就不能叫做《公开信》了，另一个方案是公开。他最后选择了公开。

立才还搞了一个笑话，原来《公开信》正文里有两个“靠边站”，这已经够恶心人的了，两个毛孩子公然敢“狂吠”林副主席两次“靠边站”。嘿，立才担心这两个“靠边站”可能被人家误会，就又加了一个“靠边站”。这可是天大的笑话。文章里的第一个、第二个“靠边站”是我写的，第三个是他加的。他加进去的意思，是好意，是想说对不起，但你们的批评得都不在理。后来，人们开始批判《公开信》，到处都说我们猖狂攻击林副主席到了极点，居然“狂吠”三次，要林副主席“靠边站”。但是，没有几年，林副主席确实“靠边站”了。

◇ 《公开信》带来的风风雨雨

涤西：好嘛，没想到《公开信》把天捅了一个大窟窿，我们农大附中一下子跟开了锅似的，热闹起来了。其实，当时支持我们观点人是很多的。整天学校里人山人海的，络绎不绝。

北京各大专院校的、政府机关各大部委的、各大军区的军人，都有来我们学校串联的，好多都是成年人。同学都说，这回咱们学校可出名了。我记得当时万润南（8）也找来了，他说观点可以讨论，而且你们提的也有积极意义，但是应该采取寄信的方式，不应该公开。你这一公开不就伤害林副统帅了吗。还有一个人给我的印象最深了，他穿着呢子大氅，倍儿干净，白衬衫也是新的，皮鞋也特别亮，骑着一辆锃光发亮的永久牌自行车。这人50来岁的样子，一看就是局级干部的派头，说出话来也不一样。他专门来找我要《公开信》的传单，还问我们为什么要公开化？还跟我聊了聊思想背景，看过些什么书？我估计这人是中央文革或者是毛泽东派的。

我当时有一个习惯，对每一个人的态度、观点，我都记录在小本子上。对不同意见我们观点的，大体上不记录，但对表示感兴趣的，我都有记录。

引起我警惕的有这么一件事：这张大字报发表以后，北京航空学院的曹XX找来了，他是军队干部子弟，是北航“中国国际红卫兵”组织的头头。他表示支持我的观点。当时跟他们聊聊，很有意思。他们搞得声势挺大，据说参加者有不少中、下级的现役军人。我也到他们那里看了看，有个白晓宏，原来是反工作组的头儿，是北航红旗第一任的头儿，是顶尖的人才。他用隐

喻的、含蓄的文字，让你能意会不能言传，全都是含沙射影地指向林彪。而且他也操纵着北航“八一纵队”。他们的动作比我们激烈凶猛，接连贴出了一问、二问、三问、也问中央文革的四篇大字报。

我没有主动靠拢他们，但我与他们保持关系，旁观他们的动态。我看到他们确实在反对林彪，心里也是有些恐慌，相对感觉到安全问题了。刘握中对我说，立才，咱们碰到大个的了，有一群人在反林彪呢……我说，我们跟人家不一样，咱就是给林彪提个意见，咱咋能反林彪呢？反林彪可不是咱们的观点。我马上否定了说我们反林彪，在这问题上还是不一样的。

我真正意识到我们行为的实质，还要感谢这样两位姐姐。当时来找我们的有一个化名“红匕首”，一个化名“向阳”的两位北航的女学生，她们的真名我一直不知道。她俩都是将军的孩子，看起来都很精干。她们表示同意我们的观点，但是临走时说了一句话：你们实际上是站在刘少奇的政治立场上的，是右的，是反文革的。这句话“铛”地把我敲醒了，我心一下子就凉了。我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点，被她们点醒了以后，我就开始思考了——这大字报是不是右了？这才开始警觉了。

在这前后，刘少奇、邓小平虽然还没被点名，但是大家已经心知肚明了。我们闹了半天落成右的了？这都是当时的实际思想。我没有反省，只是思考，从政治上判断，我的政治角度站到哪里了。我本质上是拥护文化革命的，认为文化革命是在推进大民主，在往国家政治的机构深层改革上面推进，另外，我们反对个人崇拜，于是，我们就开始往这方面探讨。

伊林：白晓宏是在11月20日找到我们的。他们和部队有着很深的关系，据说曾联络了数百上千的青年军官。对于我来讲，基本上属于被白晓宏他们支配着的。我觉得跟他们呆在一起有种安全感。立才跟我还不太一样，他主要是自己思考，保持距离。

我们的大字报是11月15号贴到清华的，让蒯大富给撕了。第二天，我们在北大三角地又贴了一份。传单是18号散发出去的，印传单全是立才做的事。他是红卫兵的头嘛，有一帮哥们，有抄大字报的、有刻蜡板的、有印传单的、有抄传单的、有发传单的，一套系统。还有我们学校高一的一个学生，叫瓦罗佳，他爸爸是老布尔什维克，娶了个苏联媳妇，生下了瓦罗佳。他是半个苏联人，瓦罗佳就把这个传单递给了苏联大使馆。这令我们有点害怕。

有不少人告诉我，《公开信》引起了一连串的“炮打司令部”，这是我们哥俩没想到的。但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那就是瓦罗佳的传单弄得全世界都知道了。本来只是林彪在一个军事学院的讲话，没太多的人知道。这一下子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都非常恼火。你们中共也太狂了，说百分之九十九已经够恼火的了，你还要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高得多，比共产主义的始祖还要高得多，不是站到我们头上拉屎吗？这给了各国共产党一个证据，一连串地群起攻击中共，连阿尔巴尼亚也不买账了。这是瓦罗佳的功劳，也把老毛的火拱起来了。从后来披露的资料看，林彪大概自己也知趣，此后再也没有重复过“百分之九十九”和“高得多”、“几百年”这样地说法了，从此，全中国的吹捧就停留在这个层次上，没有“更上一层楼”。

毛泽东是看过这篇文章的。有人说毛泽东给江青的那封信是假的，我们的体会，那封信是百分之百存在的。韩爱晶后来告诉我，当时，江青对蒯大富、韩爱晶说到这件事时，是这么讲的：这两个小家伙名字有点怪。你们对这两个小家伙的批判，不要搞得那么激烈嘛，盖上就是了。你们怎么这么傻，把这大字报撕了。撕了人家就有理由了，他们就开始到处发传单了。还有一次她在北航还说，那篇文章很有文采嘛，你们要文斗。那意思就是要对我们客气些。从后来毛泽东让他们放我出来，也印证了毛泽东跟林彪的分歧时间。他说：改善无产阶级机构是可以的，彻底改善是不行的。这是毛泽东原话。

后来，毛泽东在1970年庐山会议果然对“天才论”发怒了，这全记到陈伯达、林彪身上去了。林彪拍马屁拍过了，如果他当初能听进去我们忠言逆耳的话，收敛一点，也许不至于是这样的结果。当时有句话最清楚了，什么毛主席缔造的军队，林副主席指挥的军队。毛主席对这些事，警惕性高着呢。吹捧得太离谱了，连两个中学生都看得出来问题，毛泽东心里怎么想？我们这件事，多少都会刺激他提防林彪篡权的警惕性。

那年12月2日的傍晚，我和立才正在附中宿舍楼三楼北头的宿舍看书，两位穿着没有帽徽领章军装的女学生，推门进来，自我介绍说：“我们两个是北航的大学生，一个叫向阳，一个叫红匕首，我们赞同你们《公开信》的基本观点。”听到有支持者，立才与我便高兴起来，和她们你一句我一句随便聊了起来。文化大革命时期，观点相同的，一起讲话就和气，你一句我一句还抢着说话。要是观点不同，就话不投机半句多。八点多，她们站起来要走。突然，俩人绷起了脸，对着我们严肃地说：“你们要知道，你们实际上是站到了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立才和我听了吓了一跳，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原以为她们会亮出反对者的真面目，她们则又说：“刘少奇、邓小平有什么不好，他们有什么错，他们没有什么错。”俩人并不告诉我们真实姓名，却重复说了她们住的宿舍：“北京航空学院女生宿舍24号楼西边上二楼右边第二间”，要我们有事就去找她们。我们感到惶恐，向阳、红匕首她们那一句话，让我们开始认识到，自己那封《致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的言行，在行动效应上，实际上是站到了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边，站到了刘少奇、邓小平右的一边。

◇ “革命群众”抓捕“反革命”

绦西：《公开信》发表后，江青、康生、陈伯达都公开讲话了，把我们打成了现行反革命，等于是画句号定性了。局势明朗了，我们就想做些防范措施了。可是我们往哪里躲呢？我们俩分工，他在校外活动，我在学校看情况。我的几个同学，利用学校已经停用了的浴室，修建了一个密室。你一眼看去，屋子里好像塞满了各种旧家具，实际上有个通道可以钻进去，有一块空地，有张课桌，开开窗子就可以跑到外面去。里面还有床可以睡觉。他们出于同学之间的感情，搞了不少花招。要是没有这个密室，我早就被人抓走了。

好像是12月17号，学校里没什么人，我就在密室外边溜达。刚走上学生宿舍的台阶，一个同学就拉着我往浴室跑，把我给推到密室里，然后把门倒锁上。他刚锁好门，北航“红旗”的人马和我们学校“红旗”的人就过来了。我听见他们在外边打我那个同学，让他开浴室的门，他就是不开。可是我们学校“红旗”派了人盯梢，看见我跑进来了。我想这样不行，打开窗子就跳了下来。这一跳，被操场上的那帮人看见了，大喊“抓住他”，就追过来了。我那时候腿还没有因为坐牢被弄坏，跑得相当快。一米多高的栅栏，我腾地就蹿过去了。这时天已经黑下来了，我躲到一个角落的阴影里，那些人从身边跑了过去，没抓到我。

第二天，我先去了北航，了解到白晓宏、曹XX已经被捕了，是中央文革指示韩爱晶以群众组织的名义扭送到公安局去的。我去了北京图书馆找刘握中，恰好碰见他出来。我一看见他就问，你怎么变样了？ he说是北航那两个女生向阳、红匕首给了他化妆的用品，还给了钱和一百多斤全国粮票，让我们赶紧逃跑。我说他们已经到学校抓咱们了。我们商量，这样抓我们是违反十六条的啊。所以，还得再写一张大字报，贴到中南海附近去，然后再往外地跑。于是，我们先到了北京市委，那时候市委很乱，有不少空房子，可没暖气，冷得呆不住人。这时，已经是凌晨了。刘握中就说，上我姑姑家去，没人知道那里。

刘握中姑姑住在东四。我们进了门，刘握中就倒在床上睡觉了，他姑姑家的人也都睡着了。我在写字台那里起草大字报。大约还不到半小时吧，一道电光就从窗外照了进来。我知道是抓

我们的人来了，肯定是跑不掉了。于是我对外边说，你关上手电筒吧，别闹大了。等外面的人关上手电后，我就把记录着那些同意我们观点的人的小本子掏出来，塞到炉子里面烧掉了，否则，将牵扯一大群无辜的人。万润南他们也就这么被保护下来了。外面带人来逮我们的，就是以前我们班经常一起读书讨论的一个同学。他知道这里，这次是他带着北农大“东方红”的人来的，开了两辆汽车。我烧了那小本子后，就把刘握中叫了起来，开了灯，一块出去了。

他们把我们一直抓到北农大，天亮后就被警车送进了“半步桥”监狱。我并不恨那个来逮我们的同学，客观上，逮进去倒是少受了很多罪，关在里面多少还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和我们一批被抓的还有李文博、乔兼武。随后，中央颁布了一个所谓的《公安六条》，这跟我们这件事是有很直接的关系。

这个事件前后也就30多天。时间虽然很短，但事实上，它导致了反中央文革、反康生的“十一月黑风”、“十二月黑风”，这股风是由下而上的，使正在按部就班前进的文化革命节外生枝地受到阻滞。

伊林：白晓宏他们被抓后，1966年12月19日，听到学校的“联动”们说，要狠狠打击敢于反对林副主席的人，我便悄悄离开北农大附中，傍晚时分来到北航女生宿舍24楼二楼右边第二间房门口。敲开门，只有向阳、红匕首她们两个人。她们见是我，赶紧将我拉了进去。向阳说：17日夜里，韩爱晶的红旗将13号楼军队接待站抄了，将白晓宏、曹伟康他们几个人都抓走了。这时窗外的喇叭里正慷慨激昂喊着：“砸烂白晓宏、曹伟康狗头！”、“打倒反对林副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她们又反复谈起了两个司令部的事，说你们别犯傻了。她们翻出二十斤全国通用粮票和十五元钱放到我手中，要我快点逃出北京。像姐姐嘱咐弟弟那样，再三叮咛，一定要逃出北京，也不要在外省的城市里，逃到外省农村去，越远越好。她们到楼道里看了看没有人，给了我一项棉帽子，我就遮着脸很快溜下了楼。但是，与立才正准备第二天离开北京时，半夜在国子监官书院被捕。

1968年8月1日，我走出功德林监狱的大门。管理监狱的士兵将入狱前搜去的物品归还我，向阳、红匕首送给我的人民币和全国粮票，仍然在小包里边。说起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危难时的救助，我怎能忘记呢。以后好多年，我多次找寻她们，但不知真实姓名，找了好几年没有找到。

◇ 第一次的牢狱之灾

涤西：我进了监狱，首先问我有什么政治背景，写《公开信》是谁支持的？预审员是个30多岁的军人，他就想要这个背景。他就问我是哪个老师、哪个副总理支持你了。查出了背景他就能邀功了嘛，踩着别人才能上呀。他倒没有给我用刑，就是发脾气，吓唬我。当我回答我没有背景时，他咣的一下就将一杯水泼到我脸上，逼迫我说出背景来。可是，事实上就是没有啊。其实，伊林、涤西事件比较单纯。当然，这是我的观点。刘握中有另外的观点，他把后边接触的人扯进来了，比如白晓宏。我一直跟刘握中讲，白晓宏他们反林彪，咱们只是提意见，这是两个性质的事情。我还是很客观的。

受我们牵连的还有瓦罗佳，在此之前，他跟我们并没有联系。因为他把传单送到了苏联大使馆，他被关进了学校的“牛棚”，实施群众专政了。还有那个帮我逃跑的同学，北航红旗把他给捉到北航去关了两天，还挨了打。再有，帮着我刻蜡板、印传单同学，也受点了苦，帮我张贴发放传单的，都受到点打击。我们被抓之后，他们都退出了“八·一八红卫兵”，我们的组织就这样散了。

在拘留所里，我是关在单间。房子很小，大概有七、八平米左右，有个床铺，有一马桶。那里全是小房间，最小的房间只有一小条，没床板，人在里面只能站着或蹲着。半个月能让我们洗一次澡。另外还有放风，这时见面相互可以偶尔说上几句话，时间长了，看守员就喊了。

我们是按现行反革命抓的，但是，我一直没看到结论，内定的结论也没见，就稀里糊涂地呆着。一个礼拜提审两次或三次，主要还是抓我们的后台。持续了有两、三个月，实在抓不出来他们也就泄气了。事实上，像白晓宏他们可能有什么背景，可我的确没有啊。那时候我们本身还是拥护文化革命的，没想到落到右派的立场了。

坐牢期间，有时也把我们拉出去批斗。批斗的时候，没给我们上手铐。我们悄悄约好，在批斗时就一起喊口号。我们到清华大学两次、北大一次、农大一次，还游过一次街。我们一上台就一块喊“毛主席万岁”这些口号。我们这一喊他们说是扰乱会场，不让我们喊。两个人弄不动我，就增加到四个人对一个，其中有个人，你喊口号他就撕你的嘴，使劲摁着你。

伊林：清华大学批斗我们时很凶，我特恨蒯大富。他搞得那个批斗太过分了，简直快要人命了。后来我见到他，跟他说了三次。我说，老蒯，蒯大哥，你可真了不起！当时差点把我们揍死了！他说，你当时反林彪呀。

涤西：对蒯大富我开始并不恨。为什么呢？因为他反工作组，我也是反对工作组的。工作组要在我们班上划三个右派，为了保护刘握中，我和工作组进行了激烈斗争，有这么一个情结在里面。后来，他撕我们的大字报，我就对他不满，恨他的成分就慢慢地滋生了。

关押到四个月的时候，我就写检查了，不写是过不去的。我觉得总得想办法出去啊，这样何时是个头啊？我先写我认识不足，他们不满意。于是，我又检讨，我犯了右倾错误，对文化大革命不负责任。不这么写通不过啊。白晓宏在我临出来的时候，也低头认错了。刘握中也就跟着低下了头。

我是1967年5月最早放出来的，没有任何结论。公安局的车直接把我送到学校，接着学校就组织大会批斗我。其实，应该死不认错就在里面呆着算了，出来反而倒不好了。所谓群众专政都是暴力的，受的罪更大。批斗大会后，他们把我关在办公室里待了几天，后来就自由了一小段时间。

我回家后，我妈看着我哭了。她是朴素的劳动人民，她说：立才，你要告诉我，我就不让你干了，可你干了就没辄了。我原来拥护林副主席，我现在不拥护了。我父亲抱怨我母亲说，都是你惯的，结果出了这么大的事。我父亲跟我是很温和的，也不直接说我。我对他说的话，也不当回事。但我怕母亲，母亲说话对我是一句等于一万句。自打我被抓进去，我母亲就吃不下饭了，1967年7月得胃癌走了。

◇ 毛泽东派人救了命

涤西：我放出来后，一起关的刘握中、白晓宏他们都被转到北苑学习班去了。为什么先放我？内幕我不清楚。我出来自由了几个月。但好景不长，学校又把我关进了牛棚。地点就在学校一楼原来的教研室，那里不是宿舍，好管制。当时不叫牛棚，就是不让你回家，限制你的自由，实施群众专政。白天强迫你劳动，夜里有人看守。

牛棚比拘留所更可恶，整天在山上开采石头，重体力劳动。那时，我一顿饭能吃二斤馒头。我干活肯动脑子，技术好。我能找到岩缝，能判断石头的纹理走势。知道这块山石怎么能给采

下来，而且还开得方方正正。于是，由我指挥凿，凿完了用手推车从山上运下来，修学校的桥基。这样，我在学校牛棚里待了一年半。那段时间，我三姐每个礼拜都骑着自行车给我送食品、粮票和钱。这种亲情支撑着我，我俩感情最深，无论多困难，她都帮助我。

伊林：我是1968年放出来的。刚被抓进去时也没感觉到害怕。这还要感谢一个人，就是拘留所的丁所长。他胖胖的，个子不高，真是好人哇。他对我们这些孩子挺亲和的，我们从他身上得到不少温暖。老蒯快把我们斗死了，他来安慰我们，给我们送红药水，帮我们擦伤口，真的挺令人感动的。这对我们挺住自己的底线，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力量。他是个老警察，听说是从公安部挨整下来的。那老人真好，而且他胆子很大，对我们这样反林彪的人，他还打开牢门来和颜悦色地安慰你。他说，群众斗争嘛，反正是受点苦，难免有过火现象什么的。你们小孩子也不懂事。他没有把我们看成反革命，一点概念都没有。所以，我时常会想起他，非常感激这些人。张立才及与他同牢关押的谭力夫，对丁所长也都有很温暖的记忆。

我从拘留所被转到了北苑学习班，是第一期。陆定一的儿子陆德没有能来，还被关押在功德林，他对我很好，隔着窗户给我唱歌，小声唱像哄小孩一样，他没能转到学习班，我很伤心。白晓宏等人是第二期。里面当时关押了一大批“黑帮子弟”，里面什么人都有，也有些挺浑的人。负责北苑学习班的武代表，当时是八三四一部队的师政委，兼北苑学习班的军代表。我们那会几天天和他们在一起，他和营长李守文对我特好。我们这些案子是绝对判不了刑的，是在毛泽东掌控之中，别人也沾不了手。毛泽东在文革中对中国人民、对历史造成了什么，人们可以是一个评价。不过那时对我个人来说，他老人家可是恩人。

我在学习班里呆了一个半月。出来后，学校对我实施群众专政，先把我关到地牢里、水牢里。跟谁关在一起呢？就是那个瓦罗佳，当时说他是苏联特务。后来又把我关进了牛棚。那牛棚可真不如监狱，在牛棚里把人整得要死。监狱还有毛泽东管着，不会越过太多的分寸，可牛棚就不同了，所谓群众专政，打人往死了打呀。我后来真受不了了，傍晚在同学张若宏的掩护下，就从牛棚逃了出来。我跑了以后，张若宏却因此挨了一顿打，代我受罪。

我逃出来就去找武政委，说我受不了了。然后，他亲自开着一辆吉普车，带着两个干部。其中有营长李守文。他也是我的恩人，对我也特好。他们几个半夜里来的，找我们学校军宣队的马团长交涉。他们说，无产阶级司令部已经把他放了，你怎么还关着他？双方僵持到天明。那马团长坚持不干，顶着不肯放我，但是对我的态度稍微好了一点。结果没过几天，突然来了一个营长，也姓李，居然把这个团长赶走了。而且李营长亲口告诉我，他是直接奉毛主席司令部的命令，专门为解决我们的问题来的，他已经把马团长请走了。这是他的原话。他是由八三四一部队派过来的。我心说，谁这么大本事？一个营长能把一个团长赶走？除了毛泽东那道令箭牌以外，别人恐怕没这本事。后来他在学校开个大会，让我俩检查了没十分钟，照章念了几句，就没事了，我们就自由了。那可真是救了我一命。

（未完待续）
~~~~~

【往事如烟】

文学所的一些人和事

• 朱 寨 •

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光明日报》的记者乔福山同志到文学所收集反映。当时我在学术办公室接待他。因为他经常来文学所了解情况或组稿，与文学所的一些学者专家



也都熟，所以就任他自己去采访。采访后来到办公室，大致谈了谈采访的情况，普遍反映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如此硬性联系，都认为勉强，对文章那种不讲道理的气势派头，一致反感。他以个人身份对此也表赞同。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背后的政治阴谋。

这时文学所按照上面的布置，派出未参加上一期安徽“四清”的人，去江西参加“四清”。其时，比“四清”更浩大严峻的政治运动，正在来临。在驶向江西的火车上，我们在广播中突然听到公开点名批判罗瑞卿的文章。罗瑞卿是公安部部长，一向是主席安全保卫的负责人，实在出乎人们意料，令人震惊，同时预感到政治风云的不测。

同行的张白山同志，是《文学评论》的编辑部主任，有长期做编辑的政治经验，与作为主编的何其芳同志有较多的接触，关于这方面他有所了解。听了广播，我们一起琢磨，悄悄议论，担心留在家的其芳同志对此缺乏应有的警觉，应该提醒他。写信已来不及，只有打电报。电报上又不能明说，临时想出句词：“请注意天气变化，晴转阴。”电报没有打。打了又怎样？天意叵测。不过说明当时的一点心意而已。

#### ◇ 一张无名的大字报

《我的一张大字报》出来后，刘少奇同志从排名第二猛降到六七位。虽然名义上还是领导人，而“四人帮”（虽然那时还没有这个名称，其实是这样）操纵造反派，在群众大会上竟公开喊出“打倒”的口号。出席大会的周总理马上从主席台的座位上站起来，背转脸，表示反对。他当众宣告：“我还准备与少奇同志共事。”学部的造反派，也正在蠢蠢欲动。这时在文学所六楼后墙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用传抄的形式，将周总理的这一态度公布出来，大字报没有标题，也没有落款，更没有署名，用无声表达了心声，吸引了许多人来阅读，并默默共鸣。可能至今人们还不知道这张大字报的作者是何许人。但我却无意中窥见，张贴大字报的是文学所的陈骏涛。我一直记着那悄悄贴完大字报，匆匆离开的身影。

#### ◇ 当时只能那样

三顶吓死人的大帽子：“叛徒、内奸、工贼”，三本罪证材料，发到每个人。栽赃诬陷越多，漏洞越多。在当时那种逼人的形势下，岂容人质疑反问。当时我“靠边站”，临时在图书馆资料室里给我指定了一个桌位，桌上也摆了一份指定人人必读的“材料”。隗苏是图书资料室的负责人，革命群众，但为人正派耿直，又都是从东北调来的老熟人，对我依旧如故，不另眼相看，每经过我身边，有意无意做出慰藉的表情。这次她从我身边经过，望望那材料，不屑一顾，鄙弃地扭头仰脸而去。当时还有些拿不准，是我的过敏，还是她的本意。当时还不便核实，一直存疑在心。“文革”后，一起回忆起“文革”的种种，我便趁机当面向她核问。她嘿嘿一笑，自嘲地说：“咱们都不是张志新，当时只能那样。”

隗苏这位耿直正派的女同志，不幸过早地去世。而她那嘿嘿一笑的自嘲，我永远不会忘记。

#### ◇ 瘪茄子

现在记不得当时的具体年月，是江青（当时大家私下都叫她“三点水”）大搞篡党窃国政治阴谋，横行称霸的时候，女皇宝座似乎虚位以待，等待劝进。她以毛主席的名义从有关单位调集了一些人，注释古典诗词，供她消遣。文学所被调去的是古代文学组的刘世德等人。有一天刘世德同志回所，拿着两个茄子交给我，说：“这是江青同志从自称的菜园里摘下来，让我转给文学所。另外还有萝卜、南瓜，分送给其他单位。”当时我是所的总支书记，所谓的“一把手”。我听明白了，但我装糊涂说：“这是江青同志奖励你们参加注释工作个人的，我们不能无功受禄。”

他一再肯定说明是让他送交单位的，我一再说明单位收受不起。互相推卸都很坚决，却并非认真僵持。互相都笑着说，笑里似乎有什么不便明说的话。最后，为了不使他为难，我说：“好吧。”就把茄子接下来，顺手放在了办公室卷柜顶上。总支副书记张宝坤同志可能出于稳妥的考虑，建议报告请示学部领导。她向学部领导汇报请示后，学部没有说别的意见，也是让我们收下放起来算了。

据说，其他有的单位收到后，受宠若惊，举行仪式，敲锣打鼓，欢呼迎接。新华社收到的是两根萝卜，因为无法分享，便煮了一大锅萝卜汤，好像琼浆玉汤，每人分得一羹。不久以前，我在报刊上读到陈四益同志的一篇文章（很遗憾，报刊名称和文章题目都忘记了），其中还说到当年新华社的这件事。当时他在新华社，可见不是编造误传。

我们收到的那两根茄子，一直搁在那里无人过问，任其抽缩，最后成了瘪茄子，扔进了垃圾箱。当然，如果当时学部是“四人帮”直接控制的单位；如果当时的学部领导不是林修德、刘仰峤、宋一平等那样的领导；如果刘世德同志或其他知情人向江青那里反馈小报告，事情的结果都不会如此平安。

#### ◇ “默哀”

“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总理和人民同甘苦，人民和总理心连心。”恐怕没有比这更朴素的语言，高度概括了人民与周总理间的深情。

在“造反有理”的一片喧嚣中，除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所有机关都陷于瘫痪，所有大小“走资派”的“狗头”都被“砸烂”。国将不国，全靠周总理奋力支撑，才使国家大厦未塌。当造反派冲击人民大会堂，要揪斗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同志的时候，周总理挺身而出，迎立劝阻。劝说无效，他便大义凛然地说：“那么，你们就从我身上踏过去吧！”国家不能没有这样的栋梁，人民不能没有这样的精神支柱。

钟惦斐同志生前关于周总理说过一句话，我一直铭记在心：“周总理把共产主义精神人格化了。”

周总理有病，已不是秘密。虽然他依然衣着整齐，精神矍铄，儒雅慈和地出现在大会主席台和电视屏幕，但已难掩他身体的瘦弱，两颊的斑点憔悴，人们已暗暗担心。但是一旦噩耗传出，如雷轰顶，令人震惊。

噩耗传出后，我不知道学部大院里其他单位怎样，文学所的同志们不待任何通知布置，立即自发地集合起来，举行悼念。

当时运动虽然还没有宣告结束，但已不像从前，人人必须天天到所集中，挨整或整人。老先生们提前结束干校生活返京，已不必来所上班。所以当时自发集合起来悼念周总理的不是文学所的全体，但也有大半个会议室。已不能详记。不过，我清楚地记得有蔡仪同志。因为他是唯一的老先生。我想可能因为他住在建外宿舍，离得近，听到噩耗就匆匆来所，正好赶上悼念。

也许人们难以想象，悼念会上只有肃静，没有啼泣。一是因为人们还未从突来的震惊中清醒过来；二是马上想到的是总理的死与“四人帮”的迫害有关。如果说批周公旦、批宋江还是鬼蜮伎俩，含沙射影，那么趁总理病重，“四人帮”在他们把持下的“大参考”上，竟公然转载香港报刊上国民党特务写的文章，诬陷伍豪（即周恩来）曾经叛变。丧心病狂，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就在得到总理病逝噩耗之前，人们还在咬牙切齿地纷纷议论。人们的哀痛被悲愤、愤

恨所梗阻。人们的悲痛闸门彻底打开，是在总理遗体要火化的时候。人们望着驶向八宝山的灵车，欲挽不能，挥泪哭喊。那悲痛欲绝的场面情景，真是惊天动地。我不知道文学所哪些同志曾亲临现场；但我可以肯定，从那些现场悲痛者身上，也就看到了文学所同志们的悲痛。

#### ◇ 升旗

那样的一个简单的仪式，当然不足以表达人们对总理的哀思。仪式之后，人们便商议筹划怎样举行正式的悼念。不常来所的人，也来所了。一直到下班回家吃晚饭的时间，人们还聚在办公室里议论筹划未散。就在这时，学部打来关于总理逝世的紧急电话通知：“不准开追悼会，不准佩戴黑纱、白花。特别提示：各机关单位不得降半旗。”真是岂有此理。等于在群众悲愤怒火上浇油。激愤沸腾，但又无可奈何。一声“快出来看！”把人们呼唤出楼外。只见大院正面大楼顶的旗杆下，正有人在升国旗。国旗升到旗杆顶部，又缓缓降至志哀的半旗位置停住。

这时已是夜色朦胧，只能望见升旗人的模糊身影，认不出是什么人。不一会儿，那消失的人影从正楼门洞里走出来，并朝着文学所的方向走来。本来人们要像迎接一位把手榴弹塞进敌人碉堡、把人们心中的旌旗高高升起的英雄那样热情迎接他，但走近一看，那人却是还戴着“5·16”分子帽子的本所的王春元。此刻，人们一时难免迟疑了。王春元此刻仍怒气未消，有所指地唾骂了一句十分粗野却很能解气的脏话，自己知趣地走过人群，独自走进楼去。本来大家还想知道他是怎样地找到国旗，又怎样摸索着爬上楼顶，也一时就语塞了。都还有些尴尬，但不长久。很快，在共同的悲痛和哀思中，在集体悼念活动中，那些野心家、阴谋家在群众之间制造的对立、猜忌、怨恨隔阂，都被涤荡消除干净。

#### ◇ “留心！”

1976年1月8日总理逝世。群众自发的悼念被强行制止。官方举行的追悼会，草草了事。追悼会上，年迈的朱德元帅，拄着拐杖亲临现场，在总理遗体前深深鞠躬……“四人帮”压制造成的沉默，正如鲁迅先生说的那样，不是在沉默中死亡，就是在沉默中爆发。沉默在酝酿着爆发。

4月5日是清明节，是中国人扫墓祭奠的传统节日。总理没有留下骨灰，没有墓碑。天安门广场上无名的革命英雄纪念碑，正是最好的寄托。早在清明节前，纪念碑下就有了花圈，碑座四周张贴出了悼词挽联。“四人帮”也就随之放出风声，说什么幕后有黑手操纵，坏人在煽动。那首“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高高挂上纪念碑之顶。这消息不胫而走，这火炬也点燃了群众心头怒火，人们纷纷拥向天安门广场纪念碑。

我闻讯后，主要出于好奇，便悄悄骑上自行车前往。不料中途遇上了熟人哲学所的邢贲思（当时还没有现在的身份名望），也骑着自行车前往。我们并排边走边议论。他指着络绎不绝的人流，感慨而气愤地说：“谁有本事能煽动起这么多的群众！”我被纪念碑四壁、栏杆上的悼念诗词感动，更为那些拥挤传抄的人群感动，我也抄了一些回来。谁能想到“四人帮”已安排了公安机关的便衣，混在其中。更没有料到，我的身后就有人跟踪。此人出示证件，问在办公室外间办公的康公镛同志，那走进屋里的我是什么人。她替我应对打发走以后方才告诉我。她悄悄提醒我要留神警惕。后来我又不止一次到过天安门广场，那真是花海人潮。广场周围的树上和柏树篱笆上都缀满白落，如大雪后的覆盖。令人不由得默诵起艾青的诗句：“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在人群中我遇到过戈宝权同志，但我们都互相故作不相识。遇到过作家雷加，他倒是胆大，高声对我说：“我可没有在这里看到过你！”我回应说：“我也是。”那场面，那群情，怎能无动于衷！

## ◇ 花圈。挽联

清明节前夕，学部召集各所领导人会议，传达上面的紧急通知，一律不准到天安门广场，更不用说送挽联花圈。文学所是总支委员唐棣华同志出席会议的，回来照章作了传达。而人们自发的悼念活动，并没有因此停止，反而更加积极地进行。办公室的张朝范同志，为大家采购了扎花圈、写挽联用的纸张，足够佩戴的黑纱，抓紧时间，日夜进行准备。我头一次看到文学所的女同志们如此齐全，不分彼此。什么这派那派，什么你是我非，在共同的大是大非面前，在共同的大悲大痛中，都已烟消云散。一面坐在一起扎白花，一面相对涕泣共诉悲愤。

花圈扎好后，意犹未尽。除了悼念敬挽的飘带，似乎还缺什么。又在花圈中间添上了“冻死苍蝇未足奇”字句。

当时的总支宣传委员何文轩同志，张罗挽联。为了写出更好的挽联，特意请长于此道的胡念贻同志操笔，并向他保证，一切后果由他承担，解除胡的顾虑。一共写了两首，都制成长幅联。后来都被收入《天安门诗抄》。因为“诗抄”是按体裁互相打乱混编，都没有作者姓名，不知是其中的哪两首。胡念贻同志当然知道，但他已去世，我请何文轩同志辨认，他只能确认其中的一首《西江月》，现抄录如下：

五十余年心血，四千万里山河。  
谁知天下起悲歌，忽地巨星陨落。  
矢志忠于领袖，赤心力战群魔。  
一番栽获一番多，遍地花红似火。

从不久前，即2002年1月出版的乔象钟著《蔡仪传》中才知道，她和蔡仪同志在丙辰清明节也写了悼念总理的诗，蔡仪三首，她一首，一起冒着风险，到天安门广场去张贴。书中写道：

夜章，我俩把这四首诗用大字抄在一张宣纸上，装在背包里，装了一瓶糗糊，亲手贴到天安门前。

他们的四首诗也被收入《天安门诗抄》。他们张贴时，“似乎”也“看见有人影朝我们走来”，“甩开了那个黑影，平安地回到家里”。他们的诗中有这样的诗句：“遗业艰难谁予负？烟波浩渺实堪嗟。”“抢天呼地无答应，更谁重镇此乾坤？”“空有如涛伤心泪，神鹰高逝永不还。”

最近我又知道，邓绍基同志写过一首《菩萨蛮》，其中有“丰碑百尺瞻雄伟，中华多少工农泪”、“浮雕昭信史，热血平生事”等句，由刘士杰同志到天安门去张贴。童怀周编的《天安门诗文选》（续编275页）上收录了这首词。但有误植。当时文学所是否还有这样的匿名者，现在尚不知。

清明节那天，文学所的男女，排成双行长队，佩戴黑纱白花，跟随在自制花圈联幛之后，走向天安门广场纪念碑。抬花圈、挑联幛领头在先是文学所的两位壮汉和硬汉，王春元和杜书瀛。整齐的行列，悲壮的阵容，又是一些书生，格外引人注目。

沿途我没有看到学部其他单位的队伍，却遇到了不少分散在人群中学部的人。面遇外国文学所的一位熟人，他半开玩笑地威吓我说：“好你的，居然带头！”我说：“我不是作为总支书记，而是作为一个普通党员。”确实，我不过是跟随行进在队伍中，然而也分享了身在其中的悲壮激动。

文学所的故事多，这不过是我临时想到的点点滴滴。

2002年12月初

□ 原载《随笔》2010年第3期

~~~~~

【各抒己见】

毛派今日之困境与毛泽东文革中的保守主义

• 王希哲 •

对文革的“清算”，今天实在太重要了。例如，我们要想知道中国毛派今日困境的根源究竟在哪里？不“清算”文革，就不能明白。

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文献，也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临时革命宪法——1966年8月《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明白规定了文革要达到的中国政治改革目标：革命之后，中国新型的政权机构“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人民全面选举出来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这个决定，是根据毛泽东自把聂元梓大字报描绘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以来的一系列革命浪漫主义谈话，作出的。

遗憾的是，正如王希哲1980年《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指出的，最终，毛泽东表面的激进主义被他实际的保守主义所消灭。毛泽东叶公好龙，他呼喊的龙真的来了，“上海人民公社”可能带来的全国全面选举制度的前景真的来了，他又倒退了。他犹豫几天之后，否决了一月革命的《上海人民公社》。

他说：“如果都改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公社里的委员有党员和非党员，党委放在哪里呢？总该有个党嘛！要有一个核心嘛！，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它总得有个党。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能代替党吗？”推到、“夺权”了省市各级基层党委之后，还是要回归到“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不能“一切权力归公社！”

也就是说，毛泽东不断呼唤人民起来“革命”“造反”，打倒当权的，甚至在中央当权的“走资派”，但归根结底他要的，他相信的，还是党专政体制下的自上而下的官僚任命授权制度。文革的最终结果，中国的政权制度还是完全复旧。当然，打倒整肃了一批毛泽东的政敌，右派“彻底否定文革”，咬定了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私心目的，左派在这一点上，也很难予以批驳，因为事实，毛泽东手握绝对权力的文革十年，他口号激烈，也发动了人民，但却没有在保障人民与“走资派”“官僚主义者阶级”作斗争的民主制度建设上，作出一点积极的贡献，留下任何一点积极的有“巴黎公社”影子的选举制度遗产！也正因为如此，他一死，右派官僚们政变上台，才足以轻而易举地向人民把文革描述为一场毫无社会积极意义的“十年动乱”。

杨曦光曾猜测毛泽东在“上海人民公社”上的倒退，是一种对官僚主义阶级不得已的让步。是的，我们的确不能苛求历史人物的毛泽东，不能想象中国的政治改革目标能够一天之内达成，但你是革命家，你总要有一点进步给人民，总要留下一点积极的民主选举的制度建设遗产吧？

没有!“李一哲”们也朦胧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们发现，如果毛主席只是一味地号召人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去“革命”、“造反”和“五不怕”，却不在法制的建设上，为人民提供“革命”“造反”的民主制度的切实保障，鼓励人“五不怕”造反的结局，只能是让人们最终去作“反革命”，作“革命造反”的替罪羊。因此，中国人民要的，不仅是“革命”的号召，也不仅仅是“四大”的武器（这武器被邓小平右派官僚阶级上台后收缴），更要的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这才是根本。

今天毛派的困境，又是遇到这个问题了。

自1976年以来，当今的中国早已是右派权贵官僚资产阶级专政。左右两边都在反对它。反共右派不用说，想进一步向右，将中国推向非共、反共的“民主化”。左派，也天天揭露和攻击权贵官僚资产阶级专政下的修正主义“改开”，给中国工农基层弱势民众带来的痛苦，让他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罪恶。

那么，怎么办呢？

毛泽东曾为左派留下了一段话：“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

毛泽东没有为他的忠诚的后人，留下一套制度化的解决国家最高领导权落到“修正主义”右派手里，又能被“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左派依靠民主的途径夺回来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只留下了这番貌似悲壮实则虚幻空洞的政治遗言，又被称作了留给身后左派发动革命的“锦囊妙计”！

在这“遗言”里，毛泽东不是坚信身后的左派“代表了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么？为什么整整十年，你又那么的不敢相信人民民主，为什么你就不能将你手订的文化大革命“16条”中国“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的政治改革目标，坚持到底呢？或向官僚阶级让一些步，但坚持一半，或坚持三分之一，总之，为中国人民也为你忠诚的后人留下起码一点点能切实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制度性政治遗产呢？

有人说，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锻造了中国人民的革命造反精神。这是中国不同于苏东而难以彻底变色的重大保障，这就是毛泽东的政治遗产。但是，留下人民真实当家的民主的政治制度，不是比人民遭难后的“革命造反精神”更为重要，更为切实可行而更有益于人民么？

今日忠诚的毛派，能够按照毛泽东留下的那番“锦囊妙计”来革命，“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么？真“上井冈山”？“南昌起义”？1976年10月，上海马天水、徐景贤们不敢干的事，今日的毛派敢干么？强人所难。

毛泽东自信说“中国如发生右派政变，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事实如何？毛派已经“容忍”30多年了。为了解释今天还需要“容忍”下去，不需要“上井冈山”和“南昌起义”，于是，毛派中就有了一派强调说，虽然当今的中国已是右派权贵官僚资产阶级统治，但党的最高领导人胡锦涛（今后习近平），还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还悬有最后的一线希望在他们身上。只要说服胡锦涛们能支持自己，那么我们毛派今天的斗争，还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也就是一种随时注意着观察最高领导人脸色口气变化的“革命”，一不小心，踩在了框架边上，就危险，就要准备作“反革命”。

理解了这一点，明白了文革中毛泽东激烈的革命主义言辞与他实际的保守主义改革立场这

个矛盾留下的结果，才能最深刻地了解今日中国毛派挣扎中所处的艰难的困境！

毛派出路何在？

首先是争取民主。争取民主是第一位的，“反对修正主义”是第二位的。只有争取到了全民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组党自由等，你才占据了“反对修正主义”的合法阵地，再向前进，一步一步争取到了“16条”规定的中国“全面的选举制度”和“改选、撤换”制度，你才拥有了可能“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民意，用选票合法地将“修正主义集团”请下台的有效手段。

但是，右派的“宪章”，不是也提出了几乎一样的公民言论、集会、结社组党等民主要求的么？是的。基本的公民民主要求，是中国今天几乎全民的共识。中国的左派和右派力量，完全可以在这一点上，与全国民众团结在一起，结成统一战线，首先把起码的人民民主权利，争取到手。然后，再在民主宪政的框架内，展开左右两派地位平等的自由博弈和竞争。看究竟谁，能代表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民意，由它来引导和校正中国的方向。

极左派也许会拒绝与右派结成争取民主的统一战线。他们会说，“我们要的民主，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社会民主主义民主。它是与全民民主的宪政框架不能相容的。”对此，我只能回答，你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从来没有存在过，也不可能存在。它不过是一种斯大林式的共产党官僚特权集团专政罢了。它既不符合马克思的巴黎公社原则，从毛泽东的理想主义一面来说，这种斯大林式的共产党官僚特权集团专政，正是文化大革命本来要发动群众摧垮、改造的对象。何况，中国的经济基础已经全面资本主义多元化（你叫他“特色社会主义”也行），它符合今日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已经是任何力量无法改变的了，哪怕你真上井冈山革命推翻了现在的“修正主义”共产党，也无法改变。在这个资本主义多元化基础之上的民主，只能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民主。而又是这个多元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的左右翼制约，才足以保证中国今日的资本主义不致恶化走向左右的极端，最可能地保障各阶级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毛派极左派不抛弃它的这个“无产阶级专政民主”的幻想，它就永远无法摆脱它今日政治的困境。

2011年9月9日 美西海岸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